

堂名款
吉语款

或风雅或平和
或祈盼或祝福

直抒胸臆
情真意切

明清瓷器款识鉴定

堂名吉语卷



老古董丛书

明清瓷器款识鉴定

——堂名吉语卷

主 编 铁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瓷器款识鉴定. 堂名吉语卷 / 铁源主编. —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3.3

ISBN 7-80178-064-7

I. 明… II. 铁… III. 瓷器 (考古) — 款题 — 鉴定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385 号

明清瓷器款识鉴定一堂名吉语卷

铁 源 主 编

责任编辑: 林欣雨

责任校对: 刘丽颖

摄影: 杨 婉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10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张 8

开 本 889mm × 1194mm
大 32 开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
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7-80178-064-7/K · 15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主 编 铁 源
副主编 溪 明
编 委 羽 根
张良仁
马 涛
曹建文
王 洋

明清瓷器堂名吉语款识概述	1
明洪武	7
明永乐	9
明宣德	10
明成化	11
明弘治	14
明正德	18
明嘉靖	25
明隆庆	38
明万历	40
明天启	78
明崇祯	92
清顺治	114
清康熙	117
清雍正	205
清乾隆	212
清嘉庆	220
清道光	222
清同治	229
清光绪	234
明清瓷器堂名吉语款识检索表	239

明清瓷器堂名吉语款识概述

堂名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堂多指正房而言。《礼·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古时曰堂，汉以后曰殿。唐以后始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堂名也称室名、斋名、庐名、楼名、轩名、房名等。最早见于记载的堂名，大概是曹操三子曹充，据《三国志》载：曹充病危，不愿死在有妇女侍候的房子里，叫新修东堂，名为遂志之堂。隋唐以来，文人名士的别号、堂名已很风行。而明清之时，不仅文人雅士好用堂名，就连一般人家也有堂名。现今江西一些农村人家的正厅里仍悬挂堂名匾额，而且家具上亦书有堂名字样。古代沿袭下来的这一表露心迹的形式，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趣、品格，有的高尚，有的平庸，不仅透射出主人的心迹思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如清末官僚梁鼎芬，生活奢侈，附庸风雅，其堂名或庵、或楼、或亭、或斋、或轩、或馆、或阁，竟有86个之多，其名多风花雪月之类，格调低下。

瓷器上署堂名款在宋代已见端倪，如定窑的器物上就见有奉华、风华、聚秀、慈福等堂名，这些堂名均为宋代宫殿名称，由于是在烧制之后由宫廷玉作匠师镌刻于器外的，故距真正的堂名款仍有差距。而钧窑窑址出土的“奉华”款标本，为烧造前刻于外底的，堪称为最早的堂名款。元代堂名款较少，目前见有“使司帅府”和“枢府”二种。前者刻在龙泉窑青瓷盘底，为元代使司都元帅府专用器物，后者压印在景德镇白釉器物上，为元代枢密院专用器物。

明代早期书有堂名款的器物甚罕，明洪武、永乐仅有少量祭祀用器，上书祭祀用语，或“官用供器”，或“坛”字，实物甚难见到。另见有“厨”、“厨房”款识器物。明代中期书有堂名款的器物亦不曾见有，但有一些款识具有专用的含义，虽不能视其为完整意义上的堂名，如成化时的“天”字款，弘治时的“上用”等，但为皇家用器无疑。

嘉靖时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由“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顾起元《客座赘语》），一变为竞奢之风大盛。其中最能代表此风气的是藩府，永乐之后，宗室藩王虽然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权力，但他们仍是等级

社会的最高层。据史料记载，嘉靖之时，宗室造人玉牒的达四万五千多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对财富的占有，这股庞大的带有浓厚政治背景的社会势力插足于商业活动之中，这也正是嘉靖之时署有王府款识器物较多的一个原因。嘉靖之时堂名的另一特征是器物分工明确，专用器物有专用名词，如祭祀用的金簋大醺坛用、茶房、大茶房等。

隆庆之时署有堂名款识的器物较少，一则为隆庆皇帝在位仅6年，另则与隆庆皇帝即位后停罢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停止外采香蜡、珠宝、绸缎有关，使嘉靖时的奢糜之风略有收敛。再则一些民窑器物没有年款，在分类之时或划入嘉靖，或归入万历，使原本就少的隆庆瓷器更加稀罕。

万历时堂名款仍以王府用瓷为常见，一些私人堂名也较前朝见多。这是因为万历头10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达400余万。社会竞奢之风再起。而此时的商品交换活动频繁，市场发育逐渐成熟，为有别于专用的堂名，一些以窑口和作坊为名号的器物开始大量出现，丰富了堂名款的表现内容。

天启瓷器绝少见到堂名款。崇祯之时堂名又兴盛起来，考其原因，与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官僚阶层不思进取明哲保身、文人学者不问政治寄情山水得过且过的社会风气有关，故此时的堂名多风花雪月之类。

清代堂名款大量流行，考其原因与统治者推崇汉文化有关。清代的堂名款就使用者来讲，大致有四种类型，“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堂，称斋者，帝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贵达官有之，而帝王无之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同上）。

顺治时署有堂名款的器物较少。康熙时堂名大量出现，名目之多超过历朝历代的总和。这固然与康熙皇帝推崇汉文化有极大关系，但同时也说明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标准以及社会风气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由朴而渐至奢”。诚如《清经世文编》中所载：“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一日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见人朴俭，则笑以为不才；视家清素，则歉以为深耻。”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开奢风之先，纷纷订烧专用器物，致使堂名款大增。

雍正时期署有堂名款识的器物较康熙时要少，亦不如康熙时复杂，

这与雍正上位仍始终为清除官场积弊，整饬社会陋习，刷新政治而努力有关。但也不能不提及其大兴“文字狱”，使读书人噤若寒蝉。故瓷器上甚少书写堂名，以免为人穿凿附会，引来杀身灭门之祸。

乾隆时署有堂名款的器物较雍正时多，但寓意多平和。这与乾隆时主要打击下层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关。有些字词几乎成了皇家的专用，倘有人不慎用了这些字词，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如山西人王尔扬为别人的父亲写墓志铭，用了“皇考”二字，被斥为“擅用皇字，实属僭逆。”有人写了一篇《祝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被说为“创大业”就是要做皇帝。又如大理寺卿尹嘉铨，年过70，自称“古稀老人”，不料乾隆皇帝亦自称“古稀老人”，触犯了御名。这些人轻则抄家，罚边充军，重则杀头，满门抄斩，已死的还要焚骨扬灰。试想在此高压政策下，哪个文人还敢随意书写堂名？故乾隆之时堂名款虽多，但文白义实，绝少深层含义。

嘉庆之时堂名款器物较少，就目前所见可分为二类，一为沿用前朝堂名，一为新创堂名。考其原因，其一，嘉庆朝处于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皇帝继位的头四年，实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故宫中堂名多沿用前朝旧名。其二，亲政之后黜奢崇俭，力戒官员欺隐粉饰怠惰之风，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士大夫阶级及王公贵族订烧的堂名款器物较少亦在情理之中。

道光时堂名款器物渐多，尤以“慎德堂”款识最为常见。乾嘉两朝盛极一时的考据学在道光年间衰落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修身、齐家的理学。故此时的堂名多为退思、约己、求谦等。

同治时国势日衰，瓷器生产混乱无序，官窑瓷器上的堂名款多书在慈禧太后的用器上，如体和殿、大雅斋等。民窑器物较少书写堂名款。

光绪时官窑堂名款仍以慈禧用器较多，如储秀宫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朝廷政治腐败，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在慈禧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郁郁而终的现实。

吉语，旧时指好消息。《汉书·陈汤传》：“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瓷器上的吉语款识，又称吉言款、赞颂款，系指在瓷器上刻、印或书写具有祈求幸福吉祥或赞美器物本身的文字。吉语款识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的青瓷上，其典型特征是吉语与纪年连用。如出土于浙江绍兴的青瓷谷仓，器物肩颈部刻有“永安三年时，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字样。永安为三国时吴景帝孙休年号（258—264年），

洋与祥通用，意与亿通用，英与殃通用。其意为富贵吉祥，位至公卿，子孙多而寿命长，千亿年没有祸殃。最晚不过五代时，吉语款识已脱离纪年款识单独署在器物上，如浙江温州出土的瓷砚底部刻有“入朝以官上”款识；江苏南京五代南唐李昇墓出土的绿釉罐，其耳上有“大吉利”三字。宋、元之时，吉语款识更为盛行，或福寿，或大吉，或家国永安等，反映了动荡年代人们祈盼社会安宁，生活富庶的心情。

明代吉语款识器物颇多，以四、六字最为常见。明早中期多为福、禄、寿等单字吉语，一般书在器物的内心。因为《明清瓷器纹饰鉴定一博古文字卷》中已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弘治时吉语开始转向器物的底部，并且首创了四字吉语，其寓意更为明显。或玉堂金马，或长命富贵，反映了平民百姓祈求进朝为官和富裕显贵的美好愿望。

正德时吉语款识不仅承袭明早期的福、寿等单字吉语，又发挥创造了大、吉、正等吉语，同时以天下太平为吉语款识，丰富了吉语款识的表现内容。

嘉靖时吉语款识最多，除传统的福、寿、天下太平外，赞美器物的吉语款大量出现，其典型特征是堂名与赞美语共用，如潘府佳器、郝府佳器等。另一特征祝福语与赞美语共用，如富贵佳器、玉堂佳器等。

隆庆时吉语款识较为少见，具体原因详见前文。

万历时吉语款识极为常见，且较为繁杂。不仅有前朝常见的单、双字吉语和各种佳器，而且以祈盼丰收的风调雨顺和希望金榜题名的状元及第句子书在器物上，极大丰富了吉语的内涵。

天启时吉语款识较少，多承袭前朝，但亦有创新，如赞美器物“美器”即为前朝所不见有，拓宽了清代康熙时赞美器物类吉语的内容。

崇祯时吉语多有创新，如美玉于斯、禄在其中、清雅等均为前朝不见有。

清代吉语款识以康熙朝最多，也最为繁复，或××珍玩，或××雅玩，或××珍藏，或××雅制，堪称历代吉语款识之最。

雍正时吉语款识见少，以祈盼类和赞美类较为常见。

乾隆时吉语款识器物较多，由于乾隆之时好古之风较盛，故吉语多珍藏、珍玩之类，了无新意。

清代中后期，署有吉语款识的器物明显见少，各朝的时代风格并不明显，但与清早期不同的是珍玩、雅制类吉语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是

没有专指，具有自然韵味的吉语，如道光时的九月菊花，咸丰时的山高水长，同治时的富贵白头及光绪时的腋秋吟静等。

人名款是指瓷器上所署的制瓷人、作坊主、收藏者、订烧者、督陶官等姓氏或姓名。人名款在瓷器上出现较早，最迟不晚于三国时期，如江苏南京出土的越窑青瓷虎子上就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识，赤乌为三国吴大帝孙权年号（238—251年）。唐代人名款明显增多，或以姓氏和姓名书在器物上，如张、李、赵、陈家、李十造等。或姓氏与器名相组合，如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或人名与器名、吉语相结合，如下家小口天下有名等。宋元时期人名款多为作坊主姓氏，具有广告意义，如张家造、浚阳陈家造等。

明代早期署有人名款的器物不多，目前所见最早的当为天顺时器物。如天顺民窑青花回文炉外壁上书有“天顺七年大同马氏”款识。

成化时基本不见有人名款识器物，弘治时人名款器物较为常见，其特点是前为姓氏或姓名，后为自造或置用，表明器物的属性，如程隆玖三置用。

正德时人名款器物较少，目前仅见有何玉清造一种。

嘉靖时人名款器物见多，其书写方式有三种，一为沿袭弘治旧制，姓氏或姓名与造或自造连写，如陈文显造、邓奎自造等。二为姓名与年款连写，如刘信嘉靖年制等。三为地名与姓氏连写，如安定程氏。

隆庆时甚少见到署人名款器物，万历时人名款器物较多，其书写方式有三种，一是沿袭前朝的姓氏或姓名与造连写，如程玉樟造等。二是姓氏或姓名与置用连写，如前溪置用。三是号与名字连写，如青华仙子吴震，对明末清初人名款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天启时人名款识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年号与姓氏连写，如天启米石隐制等，另一为姓名与置用连写，如敬峰置用，但器物较为少见。

崇祯时人名款器物较为少见，多为前朝常见的姓名加置用式，但作坊款较为常见，其表现形式是作坊名加记字，如正旺记、正兴记等。

清代人名款以康雍乾时最多，多署在器物的外底。康熙人名款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为纯粹的人名如西园、程子受等。二为人名加别号，如吴仲兴晓山主人。三为别号加珍藏，如春育主人珍藏。四为单纯的别号，如中山人、东海鼎臣等。

雍正人名款的特征如康熙，或××造，或××雅制。

乾隆时人名款最为多见，风格亦较多变，除前朝的表现形式外，另

见有以下几种：一是官名与姓名连写，如督陶使沈阳唐英题。二是别号与堂名连写，如蜗寄居士古柏堂、陶成居士制古泉堂。三是人名之后多有印字，如唐英之印、陶成堂印等。

嘉庆时人名款器物略少，或人名与珍藏连写，或人名与制连写，没有创新。

道光时人名款器物渐多，除沿袭前朝形式外，以雕瓷上阳刻人名最为世人所称道，如李裕成、王炳荣等。另一特点是地名、人名与年款连写，如仙源陈国治作道光廿四年。

同治、光绪时人名款器物较少，书写形式没有变化。瓶类器物的人名款多与题诗句组合在一起，成为画面的组成部分，且多为书年之名号，与真正的作坊主、收藏者和订烧者的人名款本意相去甚远。

明洪武

洪武瓷器在我国制瓷史上前承元代遗风，后启永乐、宣德，但是书写款识的器物并不多见。除民窑见有“福”、“禄”等吉语文字外，官窑器物见有书“官用供器”字样的器物。《明史·礼一》载：“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洪武三年，礼部言：“‘……今拟凡祭器皆用瓷……’诏从之”。目前所见有黑地白字“官用供器”执壶，白釉墨书“官用供器”盘等器物。

黑地白釉“官用供器”款

图1为黑釉执壶残片。据复原器物，此壶文字双面书写，一面为“官用”，一面为“供器”。从残片的断面来看，有字笔划之处不见有黑釉，书写方法为黑釉底上留白，而后在留白处填以白釉。字较为规范。“器”字上下为双“口”，中为“工”字。其胎体粗松，见有糊麻点和孔隙，色泽土黄，器里有釉，当为洪武早期器物。

图2为黑釉罐残片，款字书写方式及方法一如上器，虽“官”字已残，但基本笔划完整清晰。“用”字第一划与第二划不连接，运笔流畅。胎体较上器坚致，但仍见有细小孔隙，亦为洪武早期器物。



图 1

白釉墨书“官用供器”款

洪武时见有书“官用供器”字样的白釉盘。盘在祭祀中的用途为盛黍稷、稻粱，作用相当于簠。《明史·礼一》：簠簠各二者，实以黍稷、稻粱。各一者，实以稷粱。”簠为古代食器，器与簠的形状相同，各有双耳。《明史·礼一》：“今祭祀用瓷，合古意。唯盘盂之属，与古簠簠登铎异制。”



图 2

图3为白釉盘内心款识，款字布局为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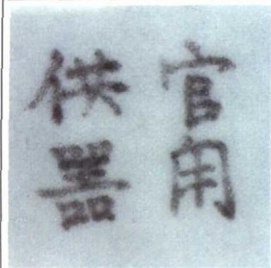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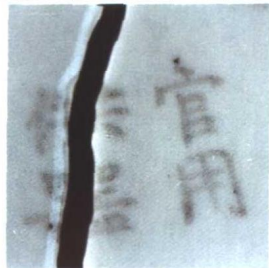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字较小，墨色浅淡，但笔划清晰流畅。其胎质坚致，色泽灰白。底无釉，但抹有一层较细的高岭土，见有火石红，并有粘砂。釉层凝厚，白度较低，洪武早期特征明显。

图 4 为白釉盘内心款识，布局及写法一如上器。成型技术不高，胎体薄厚不匀，抗变形能力较差，“供器”二字中有开裂。器型翘棱及歪扭现象明显，具有明显的元末遗风。

图 5 为白釉碗内心款识，款字书写风格与上述器物相同，但胎质极为粗松，断面处见有杂质及较大的孔隙，胎色土黄。釉层较厚，有明显的堆釉现象。外底不施釉，胎釉结合部位修削不甚整齐，早期特征明显。

明永乐

永乐瓷器绝大部分不书款识，除见有“永乐年制”、“永乐元年”及“永乐四年”外，另见有“厨房”及“厨”字款识器物，前者以墨书书在器物的内心，后者刻划在器物的外底，传世品甚罕。

白釉墨书“厨房”款

永乐时署有此类款识的器物极为少见，目前仅见有白釉盘。

图1为白釉盘内心款识，款字一行直书，墨色浅淡，字规范，起笔顿而收笔按捺清晰。胎体细白坚致，成型工艺高超，器型圆正规整。釉面光滑平整，釉色青白，无流釉现象。底无釉，但抹有化妆土，修胎精细，具有典型的永乐风格。



图 1



图 2

阴刻“厨”字款

永乐刻有“厨”字款的器物目前仅见碗类，款字刻在碗的外底心，刻划清晰。

图2为白釉碗外底款识，底无釉，施有化妆土，刻痕清晰，线条流畅。此类的胎体较为粗松，手感发飘，胎色土黄。釉层较薄，釉面光滑润泽，但有细密的开片。



图 3

图3为白釉碗外底款识，化妆土的抹痕清晰。“厨”字较大，结构略显松散。胎釉与上器相同，亦为永乐器物。

明宣德



图 1



图 2

宣德瓷器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器物上书写年号款识已成为定制，并为后世所遵循。但从传世品来看，书有其他款字的器物不多，除大量的吉语文字器物外（详见《明清瓷器纹饰鉴定——博古文字卷》），不见有堂名、人名款器物，其他杂款器物亦较少见。据文献记载，宣德时有青花款白釉盏，器底以青花书“坛”字楷款，器内另有“宣德年制”年号款识。

青花双圈“坛”字款

坛为古代祭祀天地、帝王、远祖等的场所，多用土石等建成。《书·金縢》：“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埴。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孔传：“坛，筑土”。故书有此类款识的器物当是祭器无疑，具有专用性质。

图1青花双圈“坛”字盏残底为宣德时器物，青花双圈不甚规范，内深外淡，显系先画内圈后画外圈，内“坛”字书写极为规整，浑厚遒劲，楷味浓郁。结体左小右大，右边起笔的点划与本朝年号款中的“宣”字写法相同，末笔的横划粗细适中，刚劲大方。青花色泽不匀，并有较为浓郁的黑褐色结晶斑痕，时代特征极为明显。

图2白釉“坛”字盏底款，器高5.4厘米，口径10.7厘米，足径4.6厘米。内外口沿及外足墙均有青花弦纹两道。盏心青花双圈内书“宣德年制”楷款。盏外底青花双圈线条流畅，款字布局留白较多，字体书写较上款更为规范，笔划略细。右部起笔的点划先横笔后竖笔，极具变化。横划起笔顿捺，收笔回锋，运笔刚劲有力，流畅自然。青花色泽浓艳，为宣德官窑典型器物之一。

明成化

成化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在经历了所谓的正统、景泰、天顺朝“空白期”之后，走上兴旺之路。其品种丰富，器型精巧而大气，胎釉细薄而莹润，纹饰细腻而恬静，款识虽不甚严谨而有稚拙之趣，堪称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瑰宝。然而遗憾的是署有堂名、吉语等款识的器物极为少见。就目前所见，成化官窑有“天”字款器物，民窑有少量人名款器物。

青花“天”字款

古人以天为万物主宰，《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后引申为帝王，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虢国不施妆粉，自衡美艳，常素面朝天”。用现代汉语讲，即杨贵妃姊虢国夫人卖弄自己美艳，不施脂粉朝见皇帝。故成化朝书有“天”字款识的器物皆为皇宫用器。主要见于斗彩罐上，外底中心以青花料书写，外无边饰。字体笔划均衡，起笔及收笔自然有力，运笔流畅，没有停滞之感。

图1为斗彩螭龙纹盖罐底款，“天”字上横短而下横长，左撇运笔流畅，收笔略有停顿，故青花色泽略为浓郁，右捺起笔虽细但有力，收笔先按后提，出锋明显。字体圆润，笔划刚柔相济，与本朝年号款中的“大”字写法相同，时代特征鲜明。

图2为斗彩海马纹盖罐底款，“天”字的二横略短，撇捺二划打开不大，字形较上款略显拘谨，但字圆滑丰腴，说明成化朝款识的写手并非一人。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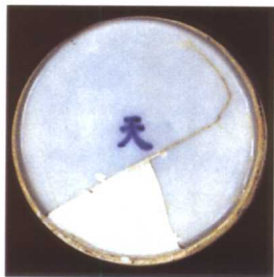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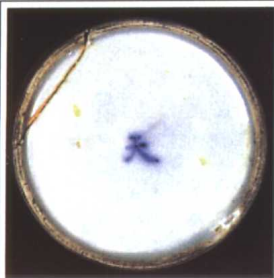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图 6

图 3 为斗彩应龙纹盖罐底款，“天”字的横划起笔藏锋，收笔回锋，撇捺二划运笔较柔，捺脚略为上挑，青花色泽淡雅清新，不见有宣德时的铁锈斑痕。

图 4 为斗彩缠枝花卉纹盖罐底款，“天”字上横短而下横长，下横起笔轻而收笔重，左撇收笔较高，右捺收笔低而按提明显，青花不见有晕散，色泽均匀。

由于成化斗彩“天”字罐的名气极大，故后世多有仿品，以康熙、雍正时仿品最为常见，而以现代仿品最为逼真。

图 5 为康熙斗彩缠枝莲盖罐底款，“天”字上横长而下横短，与真品的上横短而下横长不符，左撇起笔有顿点，运笔柔弱乏力，右捺运笔虽挺拔有力，但捺脚夸张，与康熙朝年款中“大”字的写法相同。青花色泽亦较成化时浓艳。

图 6 为雍正斗彩海兽纹盖罐底款，“天”字上横短而下横长，与真品的写法相近，但字体不及真品丰腴，刚柔相济的韵味不足，左撇收笔略上挑，为成化款识所不见有，具有本朝字体柔弱略草，不太规整的特点。青花色泽亦较漂浮。

雍正朝除斗彩“天”字款器物外，还见有青花器物，由于成化朝不见有青花“天”字器物，故凭此点就可断其为仿品。

现代仿成化“天”字款器物较多，如图 7 为现代仿斗彩“天”字罐底款。其字书写规范工整，酷肖真品。故对此类器物单从款字上进行鉴定的意义不大，应借助于胎釉、纹饰等综合分析。

青花“一”字款

成化官窑书有“一”字的器物目前仅见有图 8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一件青花双狮戏球纹高足盏，内底有青花“一”字，因系孤例，故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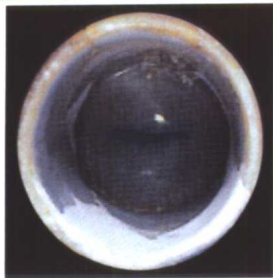


图 8



图 9

具体意义不详。

青花双框“汪氏自造”款

瓷器上署匠人姓氏始于六朝时期，如1972年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青釉鸡头壶底刻有“罌主姓黄名齐之”字样。而宋代因商品经济繁荣，署有作坊主姓氏的瓷器更是屡见不鲜，如磁州窑的“张家造”、“李家造”、“刘家造”等，这类文字适应了商业性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如前文所述，成化民窑见有少量人名款器物，无论是青花呈色，还是书写风格，本朝特征十分明显。

图9为青花双狮戏球纹碗底款，青花双框的线条粗细不匀，接痕明显。外框色深内框色浅，显系先画外框，后画内框。款字布局紧凑，“汪”字三点水均为钉头点，起笔较重，收笔有力，“王”字略小，横划平直，竖划起笔如钉头。“氏”字书写规范，笔锋明显。“自”字四、五、六划为短点，左右不封口。“造”字走之旁两笔写成，起笔不见有点划。青花双框及字体与本朝“大明年造”年款极为相近（详见《明清瓷器款识鉴定——明代纪年卷》）。青花色泽清丽透澈。